

多元文化视域下地方高校海归人才服务区域发展的思想引领机制研究

□常州大学研究生院 杨琳

引言

在地方高等教育与区域产业协同联动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海归人才作为地方高校重要的人才储备,依托其多元文化认知优势与前沿学术沉淀,成为衔接高校科研资源、区域产业需求与应用型人才培育的关键纽带。既有研究表明,海归人才的影响领域由技术进步、科技创新逐渐转向区域经济增长、企业效益等,并进一步转向社会结构、社会认同等。然而在实践中,部分海归人才存在本土情境适应不畅、对地方产业需求认知不足、服务区域发展的内驱力未被有效激活等问题,“引进来”与“用得好”之间尚存落差。如何超越传统行政管理思维,在尊重多元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将价值认同嵌入科研攻关与社会服务全过程,使海归人才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完成文化适应与身份重构,成为地方高校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一、思想引领服务区域发展的价值意蕴

将思想引领融入海归人才服务区域发展的全过程,不仅是对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理论丰富,更契合地方高校“人才强校”与“服务地方”双重使命的现实需求。

从理论维度看,以往师资研究多聚焦教学科研业务能力,较少将价值引领纳入海归人才发展框

架。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思想引领,并非简单的政治宣讲,而是通过分析跨文化认知融合规律,引导海归人才在“文化适应—价值重塑—实践落地”的渐进过程中,建立起学术追求与地方需求相统一的职业信念,弥补了既有研究对“人才—区域”互动中价值维度的关注不足。摒弃唯薪酬杠杆的研究窠臼,搭建“价值认同—认知适配—情感归属—行为耦合—制度保障”的五维融通框架,系统揭示多元文化视域下人才价值的重构机理,以此夯实地方高校海归人才工作全链条的思想引领理论基础。

从实践维度看,地方高校大多处于产业转型期的城市或新兴制造业基地,对技术改造、工艺升级、智库咨询需求迫切。海归人才携带的前沿知识与资源,若能通过有效机制引导对接区域特色产业的共性技术难题,便可实现学术优势向服务效能的转化。与此同时,引导海归人才将服务地方的实践经验反哺于研究生培养,有助于研究生形成扎根基层、直面产业真问题的工程素养,形成“人才成长—地方发展—育人提质”的良性循环。依托整套落地机制能够有效化解人才资源错配,助力高校完善师资管理制度,优化产教融合落地细则。

二、服务区域发展的思想引领机制构建与实施路径

地方高校应以“服务即引领,引领于服务”为基

本理念,将价值塑造深度嵌入海归人才工作全链条。针对海归人才多元文化背景与差异化发展诉求,需摆脱单一的行政管理逻辑,转而构建系统化实施方案。

精准识人是实现思想引领与区域发展有效衔接的前提。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系统采集海归人才的学科背景、研究方向、留学国家、发展阶段及服务意向,构建动态更新的专业人才数据库。建立海归人才信息动态台账,实行年度信息更新机制,同步联动地方产业主管部门共享产业需求清单,实现人才资源与产业需求常态化动态匹配。“一刀切”管理模式不再适用于海归人才,可按照学科属性与发展阶段分类引导: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青年导师,侧重提供产业园区考察、企业需求对接会及基层实践锻炼机会,以帮助其快速建立对区域产业图景的感性认知;对资深学科带头人,重点则放在协助对接地方重大技改项目、政府智库课题及产学研联合攻关计划,支持其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将国际前沿视野转化为区域产业升级的顶层设计能力与资源整合优势。通过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精准匹配,让思想引领建立在“了解地方、有用武之地”的现实基础上,避免空洞说教。

平台搭建是实现学术优势向产业效能转化的载体。联合地方龙头企业、高新区管委会,共建产

业研究院或联合实验室,组织海归人才通过技术诊断、工艺改进、标准制定等方式下沉产业一线,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进对本土制度环境与文化语境的理解。组建校企混编攻关团队,围绕区域共性技术设立联合课题,海归人才负责引入国际前沿方法与检测手段,企业工程师则提供工况数据与工程经验,在双向互补中自然形成目标共识与文化自信。同步设立服务地方专项研究生培养项目,鼓励学位论文选题来源于真实产业问题,推动人才培养规格与区域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评价激励是激活服务内驱力与价值认同的关键。重构以服务贡献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体系,可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和年度考核中增设“产业服务成效”观测维度,认可技术转让、咨询报告被采纳、企业技改效益证明、行业标准参与等多元成果形式,对服务成效突出的海归人才开辟晋升绿色通道。学校配套设立地方服务专项奖励经费,用于补贴横向课题落地、智库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从物质保障层面夯实激励制度。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同步配套,对来源于服务地方的横向项目在预算调剂、间接费用比例、绩效支出等方面给予适度倾斜,降低制度性摩擦成本,保护服务热情。通过评价指挥棒的实质转向,传递明确的学校导向——高水平

展舞台上建功。

协同育人是延伸思想引领链条与反哺育人的落脚点。引导海归导师将参与地方服务的真实经历,如某工业园区高盐废水梯级处理工艺优化、原料药合成工艺的绿色化改造,转化为研究生培养素材。通过开设“产业前沿案例课”、指导学生开展应用型课题与实地调研,将“服务区域、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价值观向下传导。同时,依托校企混编团队,邀请企业工程师担任校外合作导师,共同构建“学术+产业”双导师指导模式,使研究生在参与真实项目攻关中,同步习得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务实的工程伦理,实现育人质量与产业需求的同频共振。同步落地项目式实训管理制度,赋予研究生项目分工自主权,实现由被动学习者向项目决策参与者转变,夯实扎根地方的培育成效。

结语

地方高校海归人才的思想引领不应游离于业务工作之外,而需通过精准服务、平台支撑与制度激励,内嵌于其服务区域发展的具体行动中。借助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柔性引导与刚性保障并举,既释放海归人才的人力资本与国际社会资本红利,又促使其在融入地方、贡献区域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认同与价值升华。

幼儿园“一孩难求”，江苏制造需跨越“人口拐点”

□南通大学 黄美玲

近年来,人口结构迭代使江苏学前教育迎来变局,各地幼儿园普遍生源缩减、招生承压。以往依托人口红利、增量扩张的发展模式已然落幕,不少普惠园纷纷微调托班争夺生源。这一现象不仅是教育布局的调试,更是江苏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一场关键压力测试。

一、生源减少是“信号弹”

幼儿园生源减少核心原因是出生率下降。而在经济视角下,生育率走低往往与育儿成本、住房压力、职场竞争高度相关。对于江苏这个制造业大省而言,过去依赖人口数量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维系。幼儿园生源减少,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收缩。因此,生源减少其实是一记警

钟,它在倒逼江苏企业告别人力依赖,加速“智改数转”,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对冲劳动力减少带来的冲击。

二、“空出来的教室”孕育新商机

生源减少打破了学前教育的固有格局,单一学费盈利模式彻底失效,倒逼民办教育机构转型升级、挖掘第二增长曲线,苏州、南京等地的教育企业已率先探索出新路径。

一方面,“老幼共融”盘活闲置资源。江苏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银发市场需求旺盛,将幼儿园的场地、餐饮、照护能力平移到“银发经济”领域,是企业经资产转型的明智之举,因此幼儿园可利用空余场地转型成养老服务中心、老年大学。另一方面,

科技赋能高端精细化托育成为新方向。通过引入AI机器人、智能手环监测幼儿心率体温等科技手段,打造高品质、高客单价的高端托育品牌,满足21世纪父母对精细化养育的需求。

三、重新定义“教育服务”

幼儿园生源减少,本质上是学前教育传统产能与当下市场需求不匹配。行业破局的关键是以市场化、数字化思维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一是延伸服务边界,向下覆盖0—3岁婴幼儿托育,向上拓展小学生课后托管需求,在填补生源缺口的同时,精准解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民生痛点。二是升级数字服务模式,依托江苏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打造线上育儿课程、家庭教育服务平台,打破线下场地

限制,将服务范围从单一园区拓展至全网家庭,放大教育服务价值。

结语

幼儿园生源少,不是教育事业的末日,而是行业洗牌、动能转换的起点。对于江苏经济而言,这既是一场考验,也是一次机遇。对此,应立足经济视角看待行业变革。在未来发展中,与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唯有以科技补位,以精品提质,以需求赋能,持续优化教育服务模式,教育企业才能在“少子化”的寒冬中找到新的春天,继续为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力量。作为南通大学学生,我们更应立足经济视角看待行业变革。

师范生党员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融合探究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 张若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之路,教师为基。教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其德行修养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党性是政党固有的本质特性,是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员则是党性的直接体现者。师范生是教师队伍的重要后备力量,师范生党员兼具党员与准教师双重身份,既要锤炼党性修养,也要涵养师德品格。推动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深度融合,既是新时代高校党员教育的重要探索,也是提升师范生育人能力、培育高素质教师队伍的现实需要。

一、师范生党员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融合的现实挑战

当前,高校在推进师范生党员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融合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是理论与实践结合仍需紧密。当前,党性教育和师德教育虽均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部分教育内容与师范生党员的学习生活与未来职业发展联系仍不够紧密,案例素材仍不够鲜活,导致理论学习较难转化为价值认同和实际行动。尤其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师范生党员面对复杂情境和突发问题时,仍存在缺乏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

育实效。

二是外部环境影响较为明显。随着社会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师范生党员面临的思想环境更加复杂。一些不良思潮和功利化观念可能对其理想信念、职业认同和价值判断产生影响,使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在融合推进中面临现实挑战。

三是协同育人机制尚需完善。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高校、党组织、教师、师范生党员、社会、家庭等多个主体。但在实际工作中,各主体之间沟通协作仍不完全充分,职责分工亟待清晰,教育资源整合不足,尚未形成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体系化育人格局。

四是评价体系仍待健全。现有评价方式多侧重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对师范生党员的党性修养、师德意识、职业操守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关注不足,评价内容、评价方式的体系化、科学化程度有待提升。

二、师范生党员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融合的实践路径

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在目标指向上具有一致性,内容构成上具有互补性、育人成效上具有协同性,且都具有现实需求。当前师范生发展现状也需要二者加速融合,提升育人水平与质量。因此,应广泛而深入地探索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融合共促的有效途径。

第一,构建实践育人新格局。高校应把实践环节作为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融合的重要载体,组织师范生党员赴革命遗址、纪念馆、博物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通过情景体验、专题研学等方式,引导其感悟党的光辉历程,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同时,应鼓励师范生党员参与社会调研、志愿服务、扶贫支教等活动,在基层一线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把党性修养转化为服务人民、奉献教育的实际行动。充分发挥党建带团建、党建促育人的引领作用,推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效衔接,引导师范生党员把爱国爱国之情、报国强国之志融入成长成才全过程。

第二,营造校园学习新环境。高校应将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通过主题党日、师德论坛等形式,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校园氛围。深入挖掘优秀党员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等典型事迹,通过专题报告、经验分享等,引导师范生党员在榜样示范中提升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应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鼓励师范生党员分享学习心得、教学感悟和实践能力,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学习共同体,增强教育吸引力、感染力和参与度。

第三,完善协同育人机制。高校应加强统筹谋划,明确院系党组织、教师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定期开展沟通交流和工

共评。注重发挥党员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教工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结对共建,在思想引领、职业规划、师德养成等方面形成合力。同时,还应加强与家庭、社会及实践基地的联系,推动形成学校主导、教师引导、学生主体、社会支持的协同育人格局。

第四,健全一体化评价体系。推动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融合,必须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教育部门和高校应将党的创新理论、党史教育、优良传统、师德规范、职业道德和教育法律法规等内容有机整合,构建系统化课程体系和全过程评价体系。评价内容既要关注理论学习情况,也要关注理想信念、道德品质、职业认同、实践表现等方面,推动评价由单一知识考核向综合素质评价转变。

结语

新时代,推进师范生党员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深度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举措。通过融合教育,师范生党员能够在党性锤炼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师德涵养中增强育人本领,在实践磨砺中提升责任担当。推动党性教育与师德教育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引导师范生党员成长为政治坚定、师德高尚、业务过硬的新时代人民教师,为教育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善用科学思维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庞超

二、增强辩证思维,实现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互促共进、有机统一

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之间的系统关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物质生活富裕是精神生活富裕的前提条件。物质富裕为精神富足创造了良好条件,精神生活是建立在物质实践基础上的,它的发展水平受物质生活丰富程度的制约。精神生活富裕对物质生活富裕发挥着促进、引导作用。精神生活作为与其他领域生活相并列的一种独特的生活,不是被动地由物质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而精神生活富裕为物质生活富裕的实现提供价值引导、思想保证和内生动力,只有丰盈的精神生活才能推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向更高层次发展。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只有同向发力、协同发力,才能共同促成高质量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要求。

三、善用历史思维,准确把握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规律性

运用历史思维,一是要知古鉴今,善于总结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精神生活的地位和作用,将人民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融合,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在发展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使得人民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践证明,让人民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牢牢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有组织、有计划、

有重点地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不断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补齐精神生活领域的“短板”,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尺度。

二是善于从历史视野中掌握精神生活的发展规律。精神生活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有其独特的内涵、特点及自身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性。人们对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愈发强烈。我们必须了解精神生活具有的客观性、多样性、历时性和相对独立性等特点,准确把握精神生活的灵魂、根本原则和方向。

四、养成法治思维,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确立标尺准绳,提供制度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进一步强化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基础性工程、战略性任务,做到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立法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归属感和自觉践行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特别是要聚焦道德约束不足、法律规范缺失的重点领域,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推动精神产品生产者为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为作品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努力创作出更多丰富多彩、积极正面的精神文化产品。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加快构建城

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重促进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解决文化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五、用好底线思维,全面掌控精神生活领域潜在的风险因素

运用底线思维,必须全面预判精神生活领域风险来源,高度重视风险管控。防止精神生活物化隐忧进一步加剧。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深刻影响。物质消费在价值序列中的位置显著上升,精神需求的内容和形态也随之发生转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实用化、娱乐化倾向。这一变化虽带来了精神生活的多样化,但也伴随着内在意义感的稀释。伴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娱乐浪潮的来临,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生活的断裂日益明显,尤其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被人们普遍遵循的价值准则、传统观念在当前精神生活样式中已逐渐淡化呈衰微之势,精神生活也就丧失了滋养自身的文化土壤,随之造成精神生活的漂泊状态和无根痼疾。防止精神文化生活庸俗化。市场化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产带来的是消费主义和文化工业的盛行,迎合刺激了普通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也削弱了文化活动的涵育功能,造成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和目标陷入虚幻的精神满足。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我们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被动应对风险转为主动预防风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精神生活的发展方向,推动形成与民族复兴宏伟蓝图相匹配的价值理念、文明素养、精神力量和社会风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乡贤文化助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21BKS084)的阶段性成果。

剪纸创作的知识产权之困与破解建议

□中央民族大学 陆韶阁 毛龄梓 杨雅惠

当前,剪纸行业面临确权标准模糊、维权成本高昂、授权机制失序的三重困境,根源在于知识产权制度与非遗传集体创作特性的错位及市场利益分配失衡。破解之道需从制度创新、服务供给、市场规范三端协同发力,构建覆盖创作、保护、转化全链条的经济激励体系。

具体而言,确权、维权与授权三个环节各自深陷难题,相互叠加导致市场低迷。确权方面,剪纸创作具有集体创作、代际传承的属性,与著作权法个体权利主体、独创性标准、固定保护期限等规则难以精准适配。传承人中,有人以是否涉及商业使用为标准;有人从剪纸传承与非遗保护的特性出发,认为二次创作不存在侵权之说;也有人着眼于行业前景,提出个人维权应考虑行业发展利益。公权力机关对该问题的处理同样未形成统一标准。尽管各地司法机关做了有益探索,如安徽省检察院的“双轨取证法”,蔚县行政审批处尝试的专家审核登记,但前者因个案差异难以常态化,后者高度依赖前期积累与行业资源,均无法简单复制推广,大量作品游离在有效确权之外。

维权方面,成本与收益严重倒挂。一场完整诉讼需要支付诉讼费、律师费、取证等多项费用,而剪纸传承人需兼顾创作、教学与经营,没有精力处理复杂程序,加之剪纸行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侵权多发生在师徒、同行之间,往往顾及人情、关系,导致维权显性和隐性成本高昂。更棘手的是,司法实践中实际赔偿往往偏低,即使维权成功也常无法覆盖维权成本,导致“赢了官司赔了钱”,极大挫伤了维权积极性。

授权方面,商业授权与政府定制两条主渠道均存在致命缺陷。商业授权中,传承人文化水平有限,与企业签订合同时处于明显劣势地位。部分企业以低价买断永久授权或全域授权使用权,逐渐拉低行业的版权定价标准。同时,机器剪纸冒充手工销售,低价竞争屡禁不止,损害消费者的信赖,持续压缩手工剪纸利润空间。政府定制则因“三进”活动激励缺失、作品专属性强难以批量转化、资金拨付不透明、信息不畅等问题导致资金拨付往往难以有效落实。确权无据、维权无门、授权不公三者环环相扣,共同造成了创作投入与经济回报的持续失衡。

针对上述困境,笔者建议:一是织密全链条前置防护网,实现“零门槛”保护;二是借助技术支撑进行常态化自动监管,同时打通低成本事后救济路径,降低维权难度;三是深化价值转化与品牌守护,提升无形资产效能。明确版权的关键在于作品独创性认定与登记配套服务的完善。针对前者,应当聚焦基础资料收集与专家论证引入。可以普查现有剪纸作品与传承人信息,纳入数据库建设,实现信息实时比对;参考蔚县经验,组建由学者与传承人组成的专家组,对作品相似度进行专业评估。同时,配套服务的完善也是有效确权的关键。具体而言,除了减免登记费用,还应致力于畅通信息渠道,推广实体服务网点、开展在线登记平台培训,提供入行辅导等配套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

维权层面,建议构建多元共治的低成本维权体系:推广区块链等新技术固定创作与侵权证据,解决举证难题;设立纠纷调解前置程序,若明确侵权再由政府部门介入;经调解不成,检察机关支持传承人起诉;设立传承人诉讼维权支持资金,为年老或经济较为困难的传承人提供维权专项补贴,并适当提高侵权赔偿标准。

建立在前期版权登记基础之上的授权是剪纸产业赋能的必经环节。可以依托登记信息,将剪纸数据库与商业平台对接,为登记作品提供直接面向企业的授权合作渠道;探索商业授权规范,形成合理的合作与收益分配模式;逐步建立剪纸产业集聚区,实现创作、销售与人才培养的有机融合。此外,互联网销售与社交媒体的宣传也应成为未来剪纸市场开拓的主战场。